

# 从《小窗幽记》看陈继儒的文化性格

李 芳,李秀卿,许见军

(西昌学院 中文系,四川 西昌 615022)

**【摘 要】**陈继儒的文化性格,有着晚明突出的时代特征。《小窗幽记》是陈继儒在民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代表性地反映了陈继儒的文化性格。陈继儒文化性格的本质特征是对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的重新理解和定位。对个性自我的肯定,对真情至性的崇尚,以及审慎圆通的处世艺术构成陈继儒文化性格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陈继儒;文化性格;自我价值;生命意义;文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B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2-0052-04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明万历至崇祯时期著名的诗文作家、书画家。陈继儒少为高才生,与同里董其昌齐名。青年时曾两赴乡试,不中,二十九岁焚弃儒衣冠,绝意仕进,隐于昆山之阳,后移居东余山,辞谢征召,纵情山水,杜门著述,以诗文书画终老。

作为晚明山人领袖,陈继儒在晚明时代地位很高,影响极大,其生活方式和创作,都对晚明文人有明显的影响。在晚明,陈继儒并不是第一流的作家诗人,也不是第一流的思想家,却是晚明最为复杂也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陈继儒生命状态的演示过程相当独特,他经历丰富,思想博杂,是诗人、散文家、书画家、评点家,也是大山人、大名士,还是有名的畅销书编纂家、出版家,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术会稗官、雅玩清赏,无所不晓,是多才多艺,修养全面的通才。陈继儒为人甚为圆通,自如地周旋于隐逸与济世、清高与世俗之间,在当时文坛上与士林中地位显赫,权贵们倾身下交,名动寰宇,声名甚至上达皇上,普通士人更是对其趋之若鹜,有“山中宰相”之誉。其事入《明史》“隐逸传”。

陈继儒的思想融儒释道于一身,博杂而兼通,在其复杂的文化性格中,透现出丰厚的文化底蕴,反映出晚明文人生活风尚的新特质和新追求。《小窗幽记》“取杂事碎语”或“清胜之事”联缀而成,有“合述作为一心,联古今为一人”的“以述为作”的现象,并没有太高的文学价值,但作为陈继儒小品文的代表作,《小窗幽记》是陈继儒在民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代表性地反映了陈继儒的文化性格。

## 一 对个性自我的肯定

陈继儒的思想带有晚明突出的时代色彩。人的文化性格本质上是人的自我,在《小窗幽记》里,陈继儒对个性自我予以充分的肯定,自由自在地表

达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从行为层面的表现来看主要就是对科举制度的反抗和对程朱理学的叛离。尽管就当时多数的士人而言,他们仍然以参加科举,步入仕途做官为宦为人生追求,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士人开始脱离这种传统的人生道路,转而追求新的人生目标,一批开始具有自由职业特点的知识分子出现。这批知识分子大多有意脱离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而走向民间,他们主要从事一些具有世俗性、民间性的文化事业,成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人,陈继儒是这类文化人的代表之一。透过《小窗幽记》,我们清楚地看到陈继儒选择的是与传统士人大相迥异的人生道路。

在《小窗幽记》里,陈继儒多次表达了绝意仕进,流连于山水与佛教的人生追求。“闭门阅佛书,开门接佳客,出门寻山水,此人生三乐”,<sup>[1](P114)</sup>“清闲无事,坐卧随心,虽粗衣淡饭,但觉一尘不染。忧患缠身,繁扰奔忙,虽锦衣厚味,只觉万状苦愁”。<sup>[1](P158)</sup>晚明特殊的生存环境使文人学士更多地将独立的个性意识落实在范山临水的闲逸生活的追求中。对自然人生的丰富感受,并由此产生的奇思妙想和浪漫情怀,是《小窗幽记》的精神和精华所在,也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前代文人所难以达到的一种澹泊宁静的境界。

陈继儒是一个懂得生命真实的人,他以赤子之心为完美,“童子智少,愈少愈完,成人智多,愈多愈散”。<sup>[1](P25)</sup>从“宁为真士夫,不为假道学”;<sup>[1](P89)</sup>“宁为随世之庸愚,勿为欺世之豪杰”;<sup>[1](P16)</sup>“宁为薄幸狂夫,不为厚颜君子”;<sup>[1](P94)</sup>“平民种德施惠,是无位之公卿;仕夫贪财好货,乃有爵之乞丐”<sup>[1](P64)</sup>等思想,集中表现出与传统儒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同的价值取向。他之所以放弃科举之路,主要是

他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有一种不愿受制于人的品性。他追求的是真实、快乐的人生。自古以来隐士的着眼点多在“逸”,而他则着眼在“快”,这也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真放肆不在饮酒高歌,假矜持偏于大庭卖弄。看明世事透,自然不重功名;认得当下真,是以常寻乐地”,要尽情享受个人日常生活的乐趣,从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中寄托自己的真性情,勿使自己为外在的功名利禄所羁绊。他非常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清新淡远的诗意,品味真情至性:“良心在夜气清明之候,真情在箪食豆羹之间”;<sup>[1](P15)</sup>“佳思忽来,书能下酒;侠情一往,云可赠人”;<sup>[1](P30)</sup>“幽堂昼深,清风忽来好伴;虚窗夜朗,明月不减故人”。澄彻地看待人生,使他重视个性自我恬淡的回归。实实在在地活着,且快乐地活在当下,是陈继儒追求的人生境界。

## 二 对真情至性的崇尚

对真情至性的崇尚,贯穿了《小窗幽记》全书。晚明文人眼中的“情”主要指男女之情和山水之情。这两种感情的发展与升华,都与他们个性解放的意识有关,体现了个体生命的活跃。只有当人们的身心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才会对男女之间的真情执著向往,才会兴味盎然地登山临水,领略大自然的奇趣。

男女情思最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礼教所鄙弃而不容,与此相反,陈继儒认为情是人至性的袒露,男女情思是人间最能区分真情假意的试金石。陈继儒关于男女情思的小品,也最能见其真性情。“当为情死,不当为情怨。关乎情者,原可死而不可怨者也。虽然,既云情矣,此身已为情有,又何忍死耶?然不死终不透彻耳。君平之柳,崔护之花,汉宫之流叶,蜀女之飘梧,令后世有情之人咨嗟想慕,托之语言,寄之歌咏。而奴无昆仑,客无黄衫,知己无押衙,同志无虞侯,则虽盟在海棠,终是陌路萧郎耳”<sup>[1](P42)</sup>,其对男女情思的歌咏真挚而又缠绵,“当为情死,不当为情怨”的直白,是何其大胆和浓烈!

在《小窗幽记》中,有相当的篇幅抒写作者对人间男女情爱的肯定和向往。“费长房缩不尽相思地,女娲氏补不完离恨天”;<sup>[1](P43)</sup>“豆蔻不消心上恨,丁香空结雨中愁”;<sup>[1](P52)</sup>“花柳深藏淑女居,何殊三千弱水;雨云不入襄王梦,空忆十二巫山”;<sup>[1](P47)</sup>“填平湘岸都栽竹,截住巫山不放云”;<sup>[1](P53)</sup>“黄叶无风自落,秋云不雨长阴。天若有情天亦老,摇摇幽恨难禁。惆怅旧欢如梦,觉来无处追寻”;<sup>[1](P49)</sup>“几条杨柳,沾来多少啼痕,三叠阳关,唱彻古今离恨,;

将爱情的追寻与自然人生的感悟相交融,情思绵绵,在慨叹“无端饮却相思水,不信相思能杀人”<sup>[1](P57)</sup>的同时,又有“良缘易合,红叶亦可为媒;知己难投,白璧未能获主”<sup>[1](P55)</sup>的随缘与“慈悲筏济人出相思海,恩爱梯接人下离恨天”的淡定。

寄情山水,追求自然之趣,是晚明文人士子的群体特征。绝意仕途,寄情山水,也可视为晚明士人对“无道”乱世的一种反抗方式和全身之道。作为山人领袖的陈继儒,更是鸟啼花落,有会于心。“观世态之极幻,则浮云转有常清;咀世味之昏空,则流水翻多浓旨”<sup>[1](P108)</sup>,在深知官场的黑暗丑恶、扭曲压抑人性后,更显出“云霞为伴侣,青松为心知”的可爱和可贵。“云烟影里见真身,始悟形骸为桎梏;禽鸟声中闻自性,方知情识是戈矛”,<sup>[1](P33)</sup>在鸟鸣声中识得自性本真,率性而动,像行云流水那样潇洒不羁,自由自在,才能够体会到生命的真意。

《小窗幽记》自由地表现真情至性,以对真情至性的崇尚表现出反传统走向。这些袒露真情的小品,来自活脱脱的生命,超越了世用与伦理的关系,充溢其中的是对生命的诚挚和对人性的关怀。《小窗幽记》成为后世小品文颂扬真性情的范本,对清代王永彬的《围炉夜话》以及“五四”语丝体散文,都有深远的影响。

## 三 审慎圆通的处世艺术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在当时造就了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化人格。这种文化人格最重要的精神特征可以概括为“狂”和“隐”。作为晚明山人领袖,陈继儒的人生态度大致可归入“隐”,但又与传统的隐士大不相同,他将儒、道、释圆融于他的生命状态,遗迹山林而活跃朝市,不为官却交际广泛,关心世事,是“享高名、食清福”的“通隐”式山人。《小窗幽记》全面反映了陈继儒审慎圆通的处世艺术。

陈继儒圆通的处世艺术建立在清醒审慎的心态上。晚明时期虽然阳明左学破除道学的陈旧格套,体现出难得的自由精神,但整个社会的大格局依然是传统的、封闭的、严酷的。当时的文化精英,如徐渭、李贽、屠隆,都因锋芒毕露、惊世骇俗而难以存身,或发疯致死,或自杀身亡,或被劾罢官。陈继儒始终以一种清醒审慎的心态看待社会,这使得他能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安享天年,以八十二岁高龄辞世。在《小窗幽记》中,作者冷眼看人生,以“醒食中山之酒,一醉千日。今之人昏昏逐逐,无一日不醉。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声色车马。安得一杯清凉散,人人解醒”开篇,对醉于

朝、醉于野、醉于声色车马的趋名者、趋利者和豪者有着清醒的认识,以昏昏逐逐,无一日不醉的今之人为己戒。他“无事便思有闲杂念头否,有事便思有粗浮意气否;得意便思有骄矜辞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怀否。时时检点得到,从多人入,从有人入”;<sup>[1](P26)</sup>“无事如有事,时提防,可以弭遗意外之变;有事如无事,可以销局中之围”,<sup>[1](P80)</sup>时时留有余智,提防不测。这种清醒审慎的心态,是其圆通处世艺术的基础。

陈继儒正如其名,儒家思想在其思想中居主导地位。他继承了儒文化的精髓,主要表现为儒家的中庸与自律、担当与从容。在《小窗幽记》中,他追求不偏不倚的人生境界,认为“好丑心太明,则物不契;贤愚心太明,则人不亲。须是内精明而外浑厚,使好丑两得其平,贤愚共受其益,才是生成的德量”。<sup>[1](P7)</sup>他留意一念之善与一念之恶,处处审慎律己:“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sup>[1](P12)</sup>;“不留昨日之非,不执今日之是”;<sup>[1](P10)</sup>“以忍制己情,以恕制人情”。<sup>[1](P106)</sup>他不求名,认为“使人有面前之誉,不若使人无背后之毁;使人有乍交之欢,不若使人无久处之厌”。<sup>[1](P3)</sup>儒家的担当与从容,在《小窗幽记》中也多有反映:“天薄我福,吾厚吾德以迎之;天劳我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厄我遇,吾亨吾道以通之”;<sup>[1](P4)</sup>“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sup>[1](P14)</sup>“士君子尽心利济,使海内少他不得,则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sup>[1](P127)</sup>这些思想,与他在现实生活中关心世事民瘼的言行相一致。

在《小窗幽记》中,与儒家的中庸与自律、担当与从容互补的,是道家的淡泊与圆通佛家的虚空与超脱。他深知“心为形役,尘世马牛;身被名牵,樊笼鸡鹜”;<sup>[1](P68)</sup>“天欲祸人,必先以微福骄之,要看他会受。天欲福人,必先以微祸傲之,要看他会救”。<sup>[1](P9)</sup>由此,要处巧如拙,处明如晦,处动如静,以追求淡泊之守,镇定之操。他力求打透生死关,参透名利场:“贫贱之人,一无所有。及临命终时,脱一厌字;富贵之人,无所不有。及临命终时,带一恋字。

脱一厌字,如释重负;带一恋字,如担枷锁”;<sup>[1](P27)</sup>“荷钱榆荚,飞来都作青蚨;柔玉温香,观想可成白骨”。<sup>[1](P87)</sup>他向往烦恼场空的清凉世界,在二更山寺的木鱼声中破除烦恼,见彻性灵。

在人生态度上,陈继儒将儒、道、释圆融于他的人生追求中,以圆通待人处世。“人生莫如闲,太闲反生恶业;人生莫如清,太清闲反类俗情”;<sup>[1](P121)</sup>“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sup>[1](P77)</sup>要“以正敛放,以趣通板”;<sup>[1](P124)</sup>他追求的是既要担当,又要善摆脱的人生境界,既要有兢兢业业的心思,又要有潇潇洒洒的情趣。在《小窗幽记》中,可以感受到陈继儒的高度自信:“淡泊之守,须从浓艳场中试来,镇定之操,还向纷纭境中勘过”,<sup>[1](P2)</sup>他对自我的设计与安排,充满了自得之情,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从无悔言,既不欣羨高官厚禄,也不自卑,“隐逸林中无荣辱,道义路上无炎凉”;<sup>[1](P140)</sup>“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才是手段;风狂雨急时立得定,方见脚跟”,<sup>[1](P38)</sup>有阅尽寂寞繁华的淡定,更充满了洞达世事的旷达与自信。在陈继儒构建的儒道佛互补的处世艺术中,呈现出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圆通是其处世艺术的核心,体现了晚明文人通脱而不执着的生活风尚。

#### 四 结语

作为晚明山人领袖,陈继儒的人生道路带有晚明突出的时代色彩。陈继儒不再视科举为唯一正途,他凭借自己的知识与才艺谋生,出书卖画,使他获得经济的独立与宽裕,保持了一种相对自由和独立的文人生活方式,同时,他又与主流社会关系密切,保持着对现实社会的关心与介入。他一生以圆通待人处世,自如地周旋于隐逸与济世、清高与世俗之间,回旋自如地实现他的精神追求,架构的是市隐与山隐结合的隐逸之路,反映出晚明文人生活风尚的新特质和新追求。著名的《小窗幽记》,代表性地反映了陈继儒的文化性格。其文化性格的本质特征是对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予以重新理解和定位,透露出晚明一代知识分子精神人格转变的新的时代信息,是我们解读晚明文化的一把钥匙。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陈继儒. 小窗幽记[M].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3.
- [2] 季桂起. 论明末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J]. 嘉兴学院学报, 2007, 3.
- [3] 牛鸿恩. 晚明小品作家陈继儒论[J]. 北京社会科学, 1999, 3.
- [4] 吴承学、李斌. 隐逸与济世——陈眉公与晚明的士风[J]. 中国文化研究, 2005, 春之卷.
- [5] 张德建. 末世的名士风度——陈继儒刍议[J]. 中州学刊, 2006, 1.
- [6] 张静秋. 晚明山人的文化风貌及文化建构[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2, 4.

## Chen Jiru's Cultural Personality Seen in Racords inside a Small Widow

LI Fang, LI Xiu-qing, XU Jian-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an 615022)

**Abstract:** There is a clear and outstanding age characteristic of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in the cultural personality of Chen Jiru. Racords inside a Small Widow, which spread most widely among folks and had a larger influence, reflects representatively his cultural personality. The essence of his cultural personality is the understanding and positioning of one's self-value and life meaning. The self-affirmation of one own characters, the worship for real love and the flexible living art form the main content of his cultural personality.

**Key words:** Chen Jiru; Cultural Personality; Self-value; Life Meaning;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

---

(上接47页)

the two heroine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oth Antigone and Nora are revolting characters fighting against patriarchal society. Although the style, process and result of their fighting are different, their revolting character reveals "principles and spirits of love" in "feminine rules"

**Key words:** Antigone; Nora; feminine rules; Spirit of Love

(责任编辑:张俊之)

---

(上接51页)

enough because of relatively narrow scope, the scarce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compared with Han literature research whether at the macro (as a holistic concept) and micro (specific authors and works) aspects. Therefore ethnic literature is a weak link in the area of present Chinese literature study, and needs a further development. Research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 and give it a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coherent, and logical research to grasp comprehensively.

**Key words:** Ethnic Literature; Post-liberation; Commentary of Research

(责任编辑:张俊之)